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七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六期 ——
(二〇〇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4c)

【去伪存真】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	何 蜀
【千秋功罪】林彪的出逃与“叛国”罪名	易嘉岩
【史海钩沉】马思聪落难香港记	叶永烈
【痛定思痛】在毛泽东阴魂下如何忏悔	郝申树
【研究报告】红卫兵“小报”及其诗歌的基本形态	王家平
【文艺评论】对历史真实的歪曲与误读——与“姜文们”商榷	王东成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w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去伪存真】

对林彪几次天安门讲话的一点考证

• 何 蜀 •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讲话，长期以来被当作他的罪行，成为批判的靶子。比如，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或称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在这些接见中，林彪往往要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写到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称“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114页）这里显然把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讲话当成了他个人的“煽动”行为了。1966年10月，毛泽东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简史》中提到此事，称“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首先抛出这个新罪名。”（同上，119页）这样的写法，又自然会使人认为林彪是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罪名”的始作俑者，罪魁祸首。

笔者在查阅有关“文化大革命”史料中，却发现经常被用来当作批判靶子的一些“林彪讲

话”，其实并不全是他自己的，大多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写好并经毛泽东审定后安排他去照着念的；讲话表达的也并非他的个人思想，而是表达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意图和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层领导集体的思想。

1966年8月31日，正值“红五类”红卫兵（或曰“血统论”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高潮中，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对红卫兵的打、砸、抢、抄、斗大加赞赏和鼓励。在接见之前，林彪审定别人为他起草的讲话稿时，在“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边，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审定时批示给林彪：“这样修改很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118页）显然，这篇讲话基本上是别人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代林彪起草的，林彪所加写的只有那么两句，其内容与前边的话的意思并无多大不同（等于是同义反复）。毛泽东认为“这样修改很好”，可以看作是对林彪的鼓励。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又作了讲话，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专门讲到了两种不同的“炮打司令部”，说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一些“牛鬼蛇神”企图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这篇讲话稿是接见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宣部部长陶铸送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对这段话作了加写和改写，强调了不能容许“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阴谋得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135、136页）这段话，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炮打司令部”造反浪潮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毛泽东为什么要在这次讲话中作这样的强调？这是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讲话并非林彪自己写的，代表的也并非林彪的个人意愿。因为反对“牛鬼蛇神”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显然不好用来当作林彪的“罪行”，一般文革史著作很少提及这段话。

关于9月15日接见时的讲话，还有一个细节不大为人注意。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的有关注释可知，在这次接见之前，陶铸曾将替周恩来起草好的讲话稿送周审定，周于14日将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将讲话稿送毛泽东审定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即批示：“可以由两个人讲。”（见该书137页）

可见，当时的讲话，不仅稿子是由陶铸组织写作班子（当然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起草的，而且，由林彪一人讲还是由林彪与周恩来两人分别讲也是由毛泽东最后决定的。

关于1966年国庆节庆祝大会（即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的林彪讲话，同样是这样的情况。王力回忆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提出的背景时写道：1966年9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要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毛主席决定，要在林彪国庆讲话和《红旗》社论中提出这个问题。《讲话》由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起草。社论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在《讲话》中原来定稿时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在上天安门讲话之前，陶铸、王任重、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加上一个‘对’字，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十月一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不通。毛主席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力《现场历史 / 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6、67页）王力在另一篇回忆文字中则说：1966年国庆节“林彪讲话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王力《“文革”第一年》，北京《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10页），没有提王任重。是他写此稿时有顾虑未写上还是编辑有顾虑删去

了？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篇讲话稿不是林彪自己写的。因此说林彪“首先抛出”了“新罪名”云云，显然有违历史真实。

有的文革史著作提到林彪和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习惯于从两人的讲话中各取所需，引出不同的句子，强调林主要讲造反，周主要讲纪律，或者说林的讲话是高调，周的讲话是低调，等等。其实，在了解了当时这些讲话出笼的内幕之后，这样说显然就不准确了。

现在已经清楚，林彪在中共“九大”上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虽然冠以林彪的名字，但却不能算作林彪的“著作”，林彪并不拥有此文的“著作权”。同样，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作的政治报告也不应算作周的“著作”，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作的修改党章报告，当然更不应算作（也没有人会相信是）王的“著作”。总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重要“讲话”，应该区分究竟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是本人讲的还是照着别人起草的稿子念的，是按毛泽东的意图讲的还是自我发挥代表个人意愿的。否则，就容易出现把陶铸组织写作班子写的话当作林彪“黑话”来批判一类情况。

~~~~~

## 【千秋功罪】

### 林彪的出逃与“叛国”罪名

• 易嘉岩 •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四天后，9月17日，周恩来将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示“照发”。这个通知将“九一三”事件定性为林彪“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自此，“叛国”成为林彪的一大罪名。

当时给林彪定下“叛国”这个罪名的依据是什么？林彪出逃时并未宣布其目的地在哪里，更没有发布任何文字的或口头的含有“背叛祖国”内容的声明；就连那句用来证实林彪的目的是叛逃苏联的“到伊尔库茨克多远”的话，也是在事件发生近半年后，李文普才在半监狱似的“学习班”里，在专案人员的反复“开导”下交待出来的孤证。显然，在“九一三”事件后认定林彪“叛国”的唯一的依据，只是他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乘坐飞机逃出了中国国境。

“逃出国境即叛国”。这不仅是当年给林彪定罪时的认识，直到今天人们一般也还是这样认识。甚至在一些对林彪事件进行反思，为林彪进行辩护的文章中，也仍然有这样的认识。比如较有影响的陈晓宁《质疑林彪九一三事件》一文，在“林彪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林彪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等问题上，都作了雄辩的论析，但他也仍然与他反驳的一方持同样的“逃出国境即叛国”的观点，认为：如果林彪当时的目的是出逃苏联，“就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就是汉奸、卖国贼。”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逃出国境”、“逃亡国外”，是不是就等同于“叛国”、“卖国”呢？

### ◇ 以马克思、列宁为例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马克思、列宁尊为宗师。而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列宁都曾“逃出国境”，流亡于国外。

马克思本是德国人，但他为了事业的需要，曾不得不到国外逃避本国政府的政治迫害，并长期在国外从事理论著述和宣传鼓动工作，只要读一读梅林那本脍炙人口的《马克思传》，就会看到，马克思曾一次次“流寓巴黎”、“亡命布鲁塞尔”、“流寓伦敦”……梅林说，警察的大棒打杀了德国仅存的哲学思想自由，“哲学反对派如果不想怯懦地投降，就只有逃亡国外以自保。”（见该书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7月版）当然，马克思不是在面临迫害时才逃出国境的。他先已为出版上的事到了国外。1844年4月18日，普鲁士政府用通令通告各省省长，称《德法年鉴》（只出版了一期的哲学杂志）犯有“预谋叛国”和“侮辱圣上”的罪行，因此授意各省省长命令警察机关，在该杂志的出版者和主要撰稿人卢格、马克思、海涅等人一跨进普鲁士国境时就不事声张地予以逮捕（见该书第82页）。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当然再不能回国，只得在国外流亡。

在流寓巴黎一年多后，因为《前进报》事件，普鲁士政府又要求法国当局将马克思逐出法国。马克思遂被迫亡命布鲁塞尔。但普鲁士政府仍不放过他，又向比利时当局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便在这一年脱离了普鲁士国籍，而且从此没有取得其它任何国家的国籍（见该书第142页）。马克思从此成为“世界公民”。梅林评论说：“从来也没有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像马克思这样长久地完全被排除于本国人民的视野之外。”（见该书第288页）

请看，马克思不仅逃亡于国外，甚至为了免遭本国政府紧追不舍的迫害，干脆放弃了自己的国籍！这能不能被视为“叛国”呢？大约除了普鲁士专制政府外，谁也不会这样认为。

另一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的密友恩格斯，也是一样。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中，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巴登起义。梅林说：“恩格斯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就作为一个流亡者住在瑞士。”（见该书243页）当时流亡在国境之外的德国各派革命者有上千人之多。

再看另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只需读一读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列宁回忆录》就可以知道，列宁也曾逃出国境，逃亡国外（甚至是逃往本国政府的敌国）从事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有一次，列宁不得不通过芬兰逃往瑞士，为躲避沙皇暗探的追捕，他不敢走普通路线乘船，怕在码头上被逮捕，而是从冰上步行三俄里到一个海岛上乘船（应属走私船之类吧？），他一时找不到向导，两个醉醺醺的农民愿意送他，他们夜里在冰上走的时候，脚下一块冰流动了，他们几乎丧命。克鲁普斯卡娅回忆道：后来一个同志告诉她，伊里奇选的路线是多么危险，而伊里奇死里逃生又是多么偶然。列宁则告诉她说，当脚下的冰流动时，他想到：“唉，死得多么愚蠢呀！”（见该书148—149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这不是既“仓皇”又“狼狈”吗？

当时，不仅是列宁，从事反抗沙皇政府斗争的俄国各派革命者：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中的许多精英人物，都曾逃亡国外。除去沙皇当局外，没有谁会认为他们“逃出国境”就是“叛国”。

#### ◇ 中国革命家也不乏其例

被中国共产党人尊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也曾逃出国境，逃亡国外。1895年10月，他策动的反抗清朝政府的第一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陆皓东等殉难，孙中山被迫逃亡日本。以后他流亡于日、英、美、越南及南洋一些国家，在国外策动和领导推翻清政府的暴力革命。在中学学过中国历史，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都应知道，孙中山领导组成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就是由逃亡国外的革命者们在日本成立的（而日本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显然属于中国的敌国）。孙中山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才返回中国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3年，孙中山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遭到失败后，他又一次被迫逃亡日本。除了清朝皇帝和袁世凯之流，中国人谁会认为孙中山“逃出国境”、“逃亡国外”的行动是“叛国”、“卖国”呢？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著名诗人、学者郭沫若，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作为著名共产党人遭到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为了免遭迫害，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安排他逃亡国外暂避，本拟逃往苏联，但因故未成，他只得逃到了日本，在那里流亡整整十年，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的通缉实际撤销，郭沫若才回到祖国。除去“文化大革命”中无知的红卫兵，还有谁会认为他当年“逃出国境”的举动是“叛国”呢？其实，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逃避政治或人身迫害而逃出国境的事例，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并不鲜见。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一白色恐怖时期，不少共产党精英人物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安排逃往苏联，并在苏联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练。甚至，连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与会代表中不少人就是通过各种方法“逃出国境”到达苏联的。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对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年怎样化装成商人，乘坐日本轮船从上海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途中如何遇到危险，又如何因周恩来的机智勇敢从容应付而化险为夷等等，有详细的记叙（见该书第一卷第203—206页，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 ◇ “文化大革命”中的两起著名案例

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逃避政治和人身的迫害，发生过若干被迫逃出国境的事件，其中，有两起较为著名的要案，后来都得到了平反。

一起是“马思聪叛国案”。著名音乐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在政治上和肉体上遭到的残酷迫害，被迫与夫人和两个孩子一起，在友人帮助下逃出国境，于1967年1月15日偷渡香港，随后到了美国。他不仅逃出了国境，还逃到了美国（当时中国政府宣传的头号帝国主义，“最凶恶的敌人”），而且在美国发表了抨击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声明《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以亲身经历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血泪控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轰动。他自然被定为十恶不赦的“叛国者”，这一案件被定为“叛国投敌”的要案，由公安部组成专案组进行“侦查”，株连迫害数十人。1968年1月18日专案组结案报告将马思聪定性为“叛国投敌分子”。有关全案情况，在叶永烈著《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一书中有详细记叙。

马思聪的行为是“叛国”吗？其实，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就有不同说法。周恩来在与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交谈时，十分沉痛地说：“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别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基辛格回国后，还托人向马思聪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见该书第321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近十年周折，为马思聪平反的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碍成为现实。1984年12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批复中央音乐学院党委关于为马思聪平反的意见，作出《为马思聪“叛国投敌案”平反的意见》，强调“该案发生在‘文革’期间”，“马思聪所以出走，是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等等，决定“摘掉马思聪‘叛国投敌分子’帽子，在政治上恢复名誉。”1985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也强调马思聪的逃出国境流亡国外“是由于‘文革’期间遭受极‘左’路线残酷迫害的结果”。（见该书第341—342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起较为重大的类似案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二女儿刘涛“偷越国境”案。刘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学生，中共党员。文革初期是工作组斗“黑帮”的依靠对象，曾任校文革临时筹委会副主任。工作组遭到毛泽东否定后，刘涛被迫转向，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王任重等人的反复“教育”、“启发”下，写出了批判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的大字报《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和《造刘少奇的反，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在全国影响极大。以后，中共中央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刘涛对中央公布的刘少奇“罪行”专案材料产生了怀疑，逐渐开始反思和觉醒。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刘涛对中国前途绝望，与丈夫在云南和缅甸交界处准备越境出逃，被边防军抓获，押回北京作为“偷越国境罪”要犯关进秦城监狱。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2月，中央特许将刘涛先行释放。1985年公安部作出《对刘涛同志的复查结论》，称刘涛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走的，不是出于对党对祖国的仇视，而是出于对‘四人帮’罪恶行径的不满。原定刘涛同志犯有‘偷越国境罪’是不对的，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199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刘涛党籍。党龄从1965年7月起连续计算。（见张绛《刘少奇一家》27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这个案件的影响不如马思聪案那样大，因为刚发生就中止了。但其性质应该是同样的，都是因对国内政局不满，为逃避政治和人身迫害而逃出国境，逃亡（或准备逃亡）国外。目的都不是为了背叛祖国。

按照周恩来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真是无独有偶，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头人的两个家庭中，都有人走上了逃出国境之路，而且都没有成功，一个是在国境线上就被抓回。一个是刚逃出去就遭遇意外而身亡，他们都没有马思聪幸运。

比较一下林彪出逃与刘涛出逃两个案件。如果说林彪是“仓皇出逃”，那么刘涛则可以说是“从容出逃”。刘涛出逃前，作了充分的准备，离开北京前，她特地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了朱德、任弼时等曾与父亲共事的长辈，还抓了一把泥土，折了一枝柏叶带着上路。到了云南保山，她含泪给弟弟、妹妹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了鲁迅的《自题小像》诗，请大家原谅她的过错，并转告对尚在狱中的妈妈（她的继母王光美）永远的爱……（见张绛《刘少奇一家》276页）刘涛的这些行为，充分表明她在短时间内不会再考虑回国的决绝态度。而林彪出逃时，则没有作这样冷静、充分的准备，完全是一种临时决定。据目前公开的一种说法，林彪出逃前曾对内勤说：“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635页）他不但没有带多少东西，甚至连自己最心爱的女儿豆豆也没带上。显然，他没有刘涛那样“一去不回”的长远打算，更不要说有“背叛祖国”的计划了，既然当年对刘涛只定了个“偷越国境罪”，以后连这个罪名也平反了，为什么对林彪要定为“叛国”罪呢？

再比较一下林彪出逃与马思聪出逃两个案件。马思聪出逃后，不仅去了美国（中国当时的头号敌国），而且发表了反对当时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文化大革命”的声明，在全世界造成了极大影响，此外，马思聪还多次去到“国民党反动派”执政的台湾举行音乐会演出（按照当时的观点，这显然属于不可饶恕的“分裂祖国”的罪行）。而林彪出逃，并未发表任何声明，没有任何“出卖祖国”、“勾结敌国”或“分裂祖国”的事实（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所作政治报告中称林彪为苏联的“超级间谍”，更是无稽之谈）。既然可以承认马思聪案是“发生在‘文革’

期间”，“马思聪所以出走，是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等等，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历史眼光来看待林彪的出走呢？

#### ◇ 结语

当年斯大林镇压反对派，无论是对托洛茨基，还是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统统要诬之为“叛国集团”，“帝国主义间谍”。历史证明这都是诬蔑不实之词。曾指责苏联“修正主义者”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的毛泽东，自然是十分欣赏这把“刀子”的。因此，在他随时准备给别人扣上的罪名帽子中，也有一项是“叛国”；因此，彭德怀的一大罪名是“里通外国”，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这些所谓的“叛国”罪名，最终也都被最公正的历史法官洗雪了。

目前，围绕“九一三”事件中林彪的出逃，有许多争论，如：林彪出逃之前有没有说过“民族主义者”或“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的话？林彪是自己在清醒状态下走上汽车的还是在糊涂状态下被叶群、林立果挟持上车的？林彪在去机场途中是否向林立果问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等等。争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不过，双方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定：如果林彪是自愿出逃苏联，就是叛国。

回顾、对照以上历史案例，笔者认为他们的这一共识值得商榷。“逃出国境”就等同于“叛国”吗？在没有发现林彪有“背叛祖国”、“勾结敌国”的事实证据之前，要定罪名，最多只能算是“偷越国境”罪——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是“妨害国（边）境管理罪”。而且，这也同马思聪案、刘涛案一样，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

□ 原载《议报》（3 / 1 8 / 2 0 0 3）

#### 【史海钩沉】

#### 马思聪落难香港记

• 叶永烈 •

“002”号被丢弃在九龙油麻地水师塘的岸边。这条两舷刷着红底白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标语的小艇，在那里显得格外触目。

“狗头”带领着九死一生的“乘客”们，趁着晨光熹微匆匆往岸上走。一上岸，“狗头”把“乘客”们藏进一个庙堂里，吩咐道：“你们在这儿别动，我去打电话！”“狗头”在附近一所学校里，找到了电话。“狗头”给住在九龙旺角道的家人拨了电话。

当“狗头”打完电话，兴冲冲回到庙堂，天已大亮，却不见了马思聪一家，据说到对岸的香港去了。

马思聪一家，到哪儿去了呢？

小心谨慎的马思聪，上岸之后便与“狗头”分道扬镳。尽管他要去的不是香港，也是九龙，跟“狗头”正好同路，他却宁可带着家属独自行动。他不愿让“狗头”知道他去九龙，更不愿让“狗头”知道他躲在九龙什么地方。他生怕“狗头”走漏风声。因为他有着那么显赫的身份，

万一走漏一点点消息，立即就会成为轰动香港的头条新闻。此时此刻，他害怕新闻记者那竖着的耳朵，犹如昨夜在海上害怕炮艇的探照灯光。他的出走，为的是暂避“文革”，而一旦风声泄露，他就别想在九龙安居……

马思聪一家，躲进了岸边一个潮湿而又阴冷的岩洞。直到“狗头”带领“乘客”们上车远去，马思聪这才悄然出去打电话。

马思聪的妻弟王友健在香港，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可是，马思聪却选择了九龙作为隐匿之处。九龙不像香港那样惹人注目，何况，那里有着马思聪不为人知的社会关系：他的大姐马思锦和丈夫徐腾辉，原本借住在上海马思齐家。一九五七年，马思锦与徐腾辉迁往香港。一九六〇年，他们又迁往加拿大。徐腾辉的侄女徐增纯，住在九龙；马思聪十妹马思芸的丈夫何维林的父亲何焯贤，在九龙也有着宽敞的住房……

事不凑巧，拨通了九龙的电话，却没有人接。

没有办法，马思聪只好回到那长满青苔的岩洞。出走时赤手空拳，没有带一片饼乾、一块面包，身边又没有一张港币。当年，在北京马家小院，中餐厨师和西餐厨师轮流做菜，山珍海味成了家常便饭；眼下，在渗水的岩洞里，连水都一片混浊，喝不得。没有一粒米，没有一颗饭。一夜惊恐交加，一天饥寒交迫，马思聪一家非常狼狈。身边，惟有那只葫芦形的提琴匣子。唐朝著名音乐家李龟年，晚年横遭离乱，漂泊江南，身无长物，惟有琵琶：“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哀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今日马思聪，竟与李龟年同命运！

实在饥饿难熬，向当地人赊了一块面包，把早饭、中饭、晚饭“三合一”……

总算在傍晚时分，打通了电话。

在浓重的夜色之中，汽车来了。马思聪一家上车的时候，已经顾不得拍去衣裤上的泥浆了。

汽车直奔九龙亲友家。

关上大门，关上门窗，拉上窗帘，马思聪一家犹如害怕曝光的胶卷，深深地躲藏在暗盒之中，马思聪企求着有一小块安静的土地，以求度过人生的危机……

就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翌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香港报纸便刊登了“002”号小艇的照片，使马思聪大吃一惊！

那条刷满标语、语录的小艇，抛在荒滩上，实在太招人注意，一望而知是来自大陆的偷渡船。当天，这条船就被香港水警发现，拖走了。香港的报纸最为津津乐道的社会新闻，莫过于偷渡了，于是，第二天便把这条“002”号小艇的照片，登了出去。报上披露，这是广州新洲渔轮修配厂的电动拖船——因为小艇上钉着“新洲渔轮修配厂”铜质铭牌。所幸，记者们还不知道偷渡者为何许人，没有披露姓名，没有提及中国的大音乐家……

犹如一颗炮弹在马思聪脚边爆炸。马思聪仿佛觉得，他跟香港的新闻记者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这层纸随时都可能被捅破，马思聪的大名会在香港报上登出来。

马思聪仿佛觉得脚下的大地在震颤。自从躲进九龙以后，他的一家都未曾出房门一步，就



连马瑞雪好奇地掀开窗帘的一角想看一下窗外的景色，也被他制止。尽管如此，危机仍在向他逼近。如果香港警察抓住了“狗头”，他供出马思聪的大名，那就会把他避难的美梦击得粉碎。香港就在中国大陆的鼻子底下。这儿虽然挂着英国旗，但是一旦目标暴露，大陆向港方提出要求引渡，那也是完全可能的。倘若以一个“偷渡者”的身份被押回大陆，等待他的将是红卫兵的千棍万棒……一想到这些，他就不寒而栗，心乱如麻。

来得那么快，来得那么急，马思聪所担心的事，竟然在他到达九龙的第四天清早爆发了一——一月十九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地位，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开列了马思聪的头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不少报纸重新刊登了“002”号小艇照片，说马思聪于四天前与妻子、女儿、儿子一起乘这艘小艇潜往香港……

香港电台、电视台，也都纷纷作为重大新闻广播。顷刻之间，马思聪逃抵香港，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消息。

马思聪的精神防线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一家躲在门窗密闭的房间里，不敢喘一口粗气。当时的状态，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束手待毙！

香港新闻记者们的耳朵如此灵敏。他们捕捉到马思聪来港的机密信息，最初倒并不是来自那暴露了的“002”号小艇……

到达九龙的第二天，“002”号小艇的照片一出现在香港报纸上，马思聪就意识到这里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除了香港、九龙，他能到哪里去呢？

去法国吗？奥别多菲尔教授和毕能蓬教授已经多年没有联系，连是否尚在人世都不知道。

去英国吗？除了傅聪在伦敦之外，别无熟人。

去日本吗？举目无亲。

马思聪选择了美国。虽说自从九弟马思宏一九四八年去美国之后，与他联系不多，而且兄弟俩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不尽一致，不过毕竟是骨肉同胞，何况马思宏在美国音乐界已站稳脚跟，颇有影响。到了美国，借助于弟弟的介绍，他可以在那里的音乐界立足，找到工作……

可是，要去美国，谈何容易！不用说他的一家没有一张出国护照，就连他的中央音乐学院工作证，也在踏上小艇之前销毁了——他生怕在途中发生意外，留在身边的工作证将暴露他的真实身份。

眼下，空空如也的他，惟一的财富、惟一的“证明”，是那把陈旧不堪的小提琴。这是出自十七世纪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一六四四——一七三七）之手的稀世珍品。斯特拉地瓦利一生，制作了一千一百把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云杉面板木板如丝，背板的“虎皮纹”宽而明显，造型漂亮、美观。更重要的是，他的提琴的发音格外醇厚、圆润、优美、流畅，具有穿透性。几百年之后，斯氏小提琴在世界上所剩无几。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据说价值五万美金。由于几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岁的俄国小提琴家的转让，马思聪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从此，无论马思聪走到哪里，手中总是拿

着这把弥足珍贵的名琴。在出走时，他抛弃了一切，却紧紧抱着这把几百年前的小提琴。他想，倘若在香港从亲友处借到一笔钱，买了四张飞往美国的机票，到了美国，只要他拿出这把琴演奏，音乐会的收入将会偿还欠款。

抵达九龙的第二天晚上，马思聪托亲友找到了跟马家有点瓜葛的南希（Nancy）小姐。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南希小姐差一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什么？马思聪到了香港？想去美国？”当南希小姐把消息转告美国驻香港领事，领事先生也大惑不解。

香港这个地方，谎言向来是用箩筐装的，骗子多如牛毛。美国领事担心九龙那个自称是马思聪的先生，会不会是一位“马骗”先生？消息灵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从未探听到马思聪前来香港的半点消息。尽管当时中美处于对峙状态，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文革”倾注了足够的关心。

聪明的美国领事，挑选了一位酷爱音乐的馆员，随同南希小姐驱车九龙，面晤那位中国音乐家。

身边没有任何证件，短短的平头，不合身的西装显然是刚刚借来的，那个中国人睿智的目光足以表明他是颇有教养的。他操着纯正的法语，也能用英语对话，这进一步表明他的文化修养是不错的。

那位馆员吐露了对音乐的偏爱。那个中国人打开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驳的旧琴，轻轻地奏出了舒伯特的《圣母颂》。那琴声缠绵悱恻，温柔动人，一听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

动作迅速的美国领事馆当天便已从馆藏的中国报纸上，查到好几张马思聪照片。毋庸置疑，面前的中国人眉宇宽广而眉梢下弯，一双眼睛显得炯炯有神，嘴角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跟照片上的形像一模一样。趁着中国人拉琴之际，闪光灯亮了，那位馆员拍摄的照片，说是留作纪念，其实为的是连夜冲洗，让领事馆的特工专家作出最后的判别。

一曲奏毕，这位高鼻梁、蓝眼珠的美国人，忽然说起一口流利的汉语，那股“京腔”十分标准：“马先生，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李永刚吗？”

“哦，我认识他。”对于这个生僻的名字，马思聪马上作出反应，说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的同事，现在他在香港？”

“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馆员又问道，“请问，马先生知道纽顿这个人？”

“知道，知道，当年美国驻广州的新闻处处长。”

虽然没有规定什么“接头暗语”，也没有什么“土匪黑话”，凭着刚才的两句问话，那位馆员对于马思聪的真实身份，已经确信无疑了。

夜深时，他改口用粤语向马思聪道别，马思聪也操着流利的粤语祝他晚安。

就在马思聪进入梦乡之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向华盛顿发去密电，报告中国音乐家马思聪要求前往美国……

翌日——也就是马思聪抵达九龙的第三天，他的一家依然闭户幽居。马思聪一点也不知道，一场关于他的谈判，正在幕后激烈地进行着……

香港属英国政府管辖。手中没有任何护照的马思聪一家，要想从香港前往美国，必须征得英国当局的许可。

美国领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马思聪一家的要求。

香港有关方面从美国领事那里获知马思聪在九龙，立即责怪香港警察局的无能，居然对这样重要的情报毫无所知。

香港有关当局建议美国领事，双方为引渡马思聪一家进行具体谈判。香港有关当局认为，在引渡之前，必须由港方对马思聪一家进行必要的审查，盘问，而且还要全面检查身体，以便判定他们从中国大陆出走时是否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履行了这些查验手续之后，港英当局才能给马思聪一家发放证件。然后，再与美国领事具体磋商引渡的条件、途径。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光是政治审查与体格检查，起码要花费一段时间。

美国领事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尽早从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马思聪一家。可是，香港毕竟由英国人所管治，大权在香港英国当局手中，美国领事不得不听命于他……

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国故意把消息捅给新闻界，还是某方面耍了什么花样，总之，在马思聪到达九龙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闻界获知了这一爆炸性新闻。

于是乎，香港各报一哄而上，在一月十九日以压倒一切的声势，报导了马思聪的动向……

事情急转直下。正当马思聪一家阅报之后，呆若木鸡，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

两部漂亮的轿车停在门口。进门的除了南希小姐和那位已经来过的美国领事馆馆员之外，还有一位像中国神话中四大金刚一般魁梧的美国大汉，腰间挂着手枪，束着长长的子弹带——他是力大无比的保镖。

马思聪一家钻进了轿车。马思聪的怀里，抱着他的小提琴。

轿车飞驶。自从抵达香港之后，马思聪一家这才有机会透过车窗玻璃观赏香港街景。

轿车直奔温莎大厦。

一位坐在沙发上的美国官员一见到马思聪一家，立即站了起来，伸出了长着棕色汗毛的粗壮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说道：“欢迎，马先生！”

他自我介绍说是美国驻香港领事。

领事先生满面春风，因为他在跟香港政府当局的谈判中赢了棋。他以胜利者的口气，向马

思聪宣布：“马先生，马太太，略备一桌薄酒，为你们洗尘、压惊。午宴之后，我们就一起上飞机场。”

“上飞机场？飞到哪里？”马思聪连忙问道。

美国领事放慢了讲话的节奏，把每一个字都清楚地送进马思聪的耳朵里：“飞往华盛顿！”

马思聪一下子愣住了！

在午宴上，美国领事一边熟练地用象牙筷为马思聪添菜，一边谈笑风生。三杯下肚，他说出了“幕后新闻”：自从今天上午香港各报一片哗然之后，他给香港政府方面挂了电话，询问总督先生是否已经看过今天的报纸？他说，这下子，谈判该结束了吧？如果让马思聪继续留在九龙，已经无法保证马思聪的安全，必须立即离港赴美。至于政治审查、体格检查，可以在美国补办……

“我陪你们一起去华盛顿，愿我们一路顺风！”美国领事举起了酒杯。

马思聪也举起了酒杯。这是他第一次与美国官员碰杯，他的表情显得很不自在。

“乾杯！”

“乾杯！”

马思聪放下高脚酒杯，满心惆怅。他，本想悄然避难，却闹得这般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急于跳出政治漩涡的他，已深深地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他明白，在剑拔弩张的中美两国之间，美国驻香港的领事已经把他当成一颗政治炮弹。此时此际，他推也推不掉，逃也逃不了……

□ 摘自《马思聪传》

~~~~~

【痛定思痛】

在毛泽东阴魂下如何忏悔

• 郗申树 •

◇ 毛泽东驾崩的日子

蓦然回首，那一幕已经过去二十六年了，但恍如昨岁。

九月九日上午，中央电台发出紧急通知，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在那个多事之秋，人们的神经十分敏感，纷纷猜测中央里出了大事，因为文革后重大消息都在晚上八时的“新闻联播”首播，周总理去世和天安门事件都没例外，超乎其上的定然涉及毛主席了，他二月份接见尼克松女儿女婿后没再出境。

结果不出所料，又令人震惊，竟宣告毛泽东“突然”驾崩。由于此前没发他患病的消息铺垫缓冲，哀乐声中，人们像一具具秦俑呆楞着，不少人在思考该如何表现自己的情绪，最安全的当然是悲伤。于是，有人带头抽噎，滴滴嗒嗒“传染”起来，汇成行号巷哭。

林彪叛逃摔死时，我还是个中学生，但已认清毛泽东是中国的祸源，天安门事件后，更明白“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所以毛的去世是我期盼的。但我竟跟着别人抹泪，而且不是装假附和，好似感情的自然流露，简直不可思议。这就是那个环境造就的人，经过长年强化洗脑和敬神，不仅思想意识被异化，近乎本能的情感也会非己化。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我本可以对此回眸自嘲，岂知为时过早，因为被毛泽东时代扭曲的思想意识、心智乃至情感不仅没有成为历史，还更像是毛泽东的一笔“宝贵遗产”，在关键时候与你邂逅。

◇ 未完成的湔洗

本来，毛泽东的罪愆早就该彻底湔洗了。

七十年代末，各种社会矛盾堆积如山，普通百姓很容易认清这是毛泽东二十七年暴政的恶果，北京等地出现的民主墙就是以批判毛泽东为开端，上海人民广场和淮海路等处几十米长的民主墙上，百分之九十的大字报内容是彻底否定毛泽东，公开要求废除毛泽东纪念堂，并把矛头直指搞“两个凡是”的华国锋。

当时邓小平向华国锋夺权，他要借助民意，就把非毛化作为武器向华国锋发难。他在接见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时“开明”地表示，“通过大字报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正常事情”。不到一年，他覆手为雨，“正常事情”变成了需要取缔的“不正常”事情，因为他已大权在握，不允许大字报的矛头转向他。他还通过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重新把毛肯定下来。肯定毛，为的是确立他的第二代领导人的地位，因为他和毛并无本质的区别，彻底否定毛的独裁统治，他就无法继续铁腕政治，六四验证了一切。

清算毛泽东的问题就这样半途“圆满解决”了：毛的教条继续列入宪法；毛像仍然挂在天安门上；毛的尸体照常安息在天安门广场；教科书里大量编入毛的“丰功伟绩”灌输给中小學生；毛的“光辉形像”充塞影视舞台，却禁止发表任何揭露毛历史真相的作品。

◇ 暴政的延续

毛泽东的阴魂在中华大地不散，各种悲剧持续上演。

八九民运期间，三个湖南青年走到天安门下，勇敢地把装满颜料的鸡蛋扔向毛画像，从那以后，我一直为他们的命运悬着忧心。近日才读到有关报导，三壮士的英名是：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他们采取上述行动的目的，是代表家乡人民把毛泽东请回人间正法。这是何等正气凛然的英雄壮举，因为有了他们，暴君下的奴性百姓才闪出一抹人格的亮色。也真因为他们是顺民中的异数，使当政者格外恐惧，所以重判余志坚无期徒刑、喻东岳有期徒刑二十年、鲁德成有期徒刑十六年，喻东岳因不堪牢狱折磨精神失常。

当时，是“高自联”的学生逮住三个民主斗士，并不顾他们从湖南赶来声援学生的事实，把他们转交给公安当局，还在电视里声明与“三个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学生的行动可能基于下述认识：一，学运暂时不触动否定毛泽东的问题，所以防止有人利用污损毛像栽赃学生；二，中共一贯惧怕学运向社会各界扩展，一旦发现社会人士加入，就称为“黑手”“长胡子的人”，成为改变学运定性进行镇压的借口，所以学生们希望守住单纯的学运，以降低风险并减轻失败后的惩罚。学生的策略似乎情有可原，却不料邓小平根本不顾这些，悍然动用坦克镇压单纯的学生。学生用生命的代价认识了自己的失算，也白白牺牲了湖南三壮士。

从被割断喉管押赴刑场的张志新，到因向毛像投蛋而判重刑坐牢的湖南三壮士，世人可以看清毛的暴政从他生前延续至今。

◇ 毛泽东的旗子成了双刃剑

毛泽东这面被中共高举的不倒旗，渐渐成了一柄双刃剑，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乱象，有些人打着毛的主义发泄不满，同时复燃了对毛的怀旧情结：腐败愈演愈烈时，有人追念毛泽东的“清廉”，忘了他在名山胜水到处安置豪华行宫，是中共腐败的始作俑者；农民交不完税费却得不到医疗保障和义务教育时，有人回溯文革时期乡村的夜校和赤脚医生，不知毛泽东统治的二十七年本该在农村实施这些基本福利，而且今日农村的所有问题都可从他推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中找到根由；大量工厂倒闭成千上万工人下岗时，有人展示毛泽东时代工人手上的金饭碗，不知他创立的公有制和“自立更生”窒息了工业的发展，才使工厂面对现代工业变成一堆废料；当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误炸时，“民族主义者”“爱国者”纷纷遥忆毛泽东出兵抗美援朝的“壮举”，却不知道他是用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去为另一个独裁暴君火中取栗。还有人把在毛泽东造成的苦难中得到的磨炼大加美化；更有甚者，把毛像当护身符和门神挂来避祸驱邪。一个在文革中经受过造神运动折磨的民族，三十年后再主动去敬这座“神”，不知世界上是否有解救这种超级愚昧的良方？

◇ 无的放矢的忏悔

就在这座不倒的神像下，不断有人对照德国人的忏悔和日本人的不忏悔，提出中国人应该忏悔文革的命题。几年前还掀起一个小高潮；余杰用巴金的“深刻忏悔”，质问作为四人帮写作组“石一歌”的主笔为什么不忏悔？我认为，此类要求拔高了中国人的反省层次。

以德日为例，希特勒疯狂屠杀犹太人，迎合了基督教徒排斥犹太教徒的心理，所以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认同，是延续二千年的基督教犹太教相争的极端表现；而日本人历来有“蕞尔小国，人稠地少，唯扩张才能生存”的意念，所以侵占中朝是大多数日本人的梦想；所以德日人民理应作出忏悔。

反观中国，历史上虽不乏“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事件”之类的迫害，但没有发生“人人互相批判，你死我活过关”的毛式运动的基础。尤其是文革，在长年宣教“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之后，再鼓励子女和“犯罪”的父母划清界限，导致不少父母不堪儿女的批斗自杀；还怂恿学生批判所谓的“师道尊严”，唆使无数学生殴打教师。历史上子杀父母为弑，和臣弑君同等大罪，甚至还把儿女遮隐父母的过错称为美德；而“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更是中国的古训。所以是毛泽东把自己独有的叛父心理，强加于千千万万纯洁无知的青少年，让他们干出悖逆中国人伦天理的恶行。

思想家顾准的五个和他划清界限的子女直到他死都不愿见他一面，成为他带入坟墓的最大遗憾和痛苦，能要求他的子女忏悔“不孝”吗？我十一岁时按伟大领袖的指示批斗自己的班主任，而一年前她一句批评的话会让我害怕一天，能要求我忏悔“天生的反骨”吗？

同样，“石一歌”的主笔作为经过文革“炼狱”的文化名人，他的错主要不在没反省自己的大批判文章，而是不敢对身受其害的暴君进行深刻地鞭挞。因为他的大批判再蛮横，毕竟是言论，如果不受暴君操纵利用，不一定有多大的危害。当年有人在文章里影射鲁迅拿卢布，这种攻击不亚于大批判文章，但鲁迅并没像他的学生胡风去坐牢，诬陷的人也并没像“梁效”“石一歌”那样一言九鼎。

◇ 根绝奴性 砸碎压在身上的神坛

二十世纪的几大暴君：尸骨无存的希特勒二战一结束就上了耻辱柱；斯大林死后三年就连同水晶棺材被焚烧了；波尔布特入土后受到了缺席审判；唯有毛泽东躺在水晶棺材继续“领导”他打下的江山进入二十一世纪，还不知延续多久。因此中国人首先要反省：毛泽东活着时，我们被迫做古罗马竞技场上的奴隶角斗士，不仅没有斯巴达克的勇气进行反抗，还为向毛泽东表忠心现勇气，在政治运动中你死我活地角斗，为什么毛泽东死后二十几年，仍然戴着他套在我们脚上的奴隶枷锁？

所以中国人只有根绝奴性，砸碎压在身上的神坛，成为真正当家作主的自由民，到那时再谈忏悔才有价值。否则在文革中互斗过的几千万上亿人，像巴金那样在毛像挂在天安门的大地上真诚地“忏悔”：不该写文章批判某人、不该参加某人的批斗会，其作用如同当年小学生每周也要做几次的“斗私批修”。且看今日，继承毛泽东衣钵的江泽民镇压“弱势群体”法轮功时，从中科院士到各界人士又都积极参与批判，再加公安局惨无人道的惩罚，不是毛泽东再世，文革再现了？可见，一面容忍现实的强暴，一面“忏悔”当年的卑怯，除了矫情地表现“超拔”和抚慰尚未泯灭的良心，并无多大意义。

德国人之所以能彻底反省，因为他们首先彻底清算了希特勒罪行，并用律法的形式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日本正相反，由于战后保留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天皇和天皇制，使日本的战争反省始终没有解决，这倒是注重忏悔意识的中国人需要借鉴的教训。

我们不仅要忏悔，而且忏悔的东西比德日人民还要多，也不止这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还有几千年历史中的污垢，这是中国人未来的一个大课题。

□ 原载《动向》2003年2月号

~~~~~

### 【研究报告】

#### 红卫兵“小报”及其诗歌的基本形态

• 王家平 •

在那天快亮的时候，  
一支小分队出发去卖报。  
刚印好的报纸充满油墨香，  
战士的心呵，激动地跳！

多少人等着造反派的报纸，  
多少人要看“打倒刘邓陶”的材料；  
张张报纸在人们的手中传递，  
造反派的声音在江城每个地方飞跑！

革命造反报，“来，给我三张！”  
“我要十张，零钱，不用找！”  
“小心，后面有人盯梢！”  
“记住，下次到我们厂去，多带些报！”……

多少亲切的话语呀，  
多少人热情地把手招；  
从那一双双深情的眼睛里，  
更感到江城人民和我们的心在一起跳！

呵！这哪里是卖一张张的报，  
世界上卖报者那有这样的骄傲！  
草绿色的书包里装着的  
分明是射向中国赫鲁晓夫的大炮！

——朝辉：《在那天快亮的时候》（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北京，人民教育印刷厂，1968年12月，第84、85页。）

这首诗歌描述了文革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红卫兵“小报”及其他造反派群众组织报纸的广泛出版与传播。这是当代中国出版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对私营新闻、出版业的改造后，大大小小的报纸成为由各级党组织控制下的党的机关报；毛泽东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358、359页），在运动一开始，就赋予红卫兵等群众组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这其中也包含了新闻、出版自由，几乎所有群众团体、组织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创办、编辑、发行自己的报纸。

1966年8月22日，由毛泽东题写报名的《新北大》报创刊，成为全国最早出版发行的红卫兵报纸。上海、天津、西安、广州、沈阳、成都全国各地大、中学红卫兵组织于1966年下半年纷纷创办自己的报纸，并于1967年达到高潮。这些报纸或是铅印，或是油印；版面有大有小，但以8开小版式为主，而且不少报纸是由三四人小团体创办，因此，通常被称做“小报”。红卫兵小报的创办、编发有着较大的随意性和机动性，红卫兵组织只要有一定编辑、发行人员，掌握了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油印机、纸张、房屋、运输工具等物资条件，便可以搭建起一个报纸编辑部。文革初期以登载遇罗克的《出身论》名噪全国的《中学文革报》便是典型的一例。

1966年12月底，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西城区西什库的一个电线杆上见到了一个油印的署名“北京家庭问题研究小组”写的《出身论》，读完后，产生了共鸣，于是，他循着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了六十五中的遇罗文（遇罗克的弟弟），两人谈得甚为投机，商量以铅印传单的方式扩大对《出身论》的传播。牟志京向四中总务室借了500元，又通过一位同学的关系到红卫兵“三司”宣传部开出介绍信，便来到解放军1201印刷厂，敲定了印刷事宜。不久，《出身论》排版完毕，占了8开纸的3页篇幅。为了填补一页的空白，牟志京产生了办报的念头，他请四中语文教师毛宪文当顾问，传播编辑知识，又请《首都风雷》报编辑朱维理从毛泽东手书的字中拼凑出“中学文革报”的报名，其中的“文”字取之于《解放军报》的“放”字右半边。《中学文革报》创刊时编辑部虽只有3名成员（牟志京、遇罗文、王建复），但却打出了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的大旗。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出版的第二天就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编辑部迎来了大批读者，也引起了对立派的忌恨。北大附中红卫兵头头彭小蒙率百余人砸封编辑部，而更多的红卫兵组织则是在自己



办的小报上刊载文章，就“出身”问题与《中学文革报》展开论战。《中学文革报》引发的论争引起了高层政治人物的注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点名批判了《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出到第6期（1967年4月1日）便被迫停刊（注：参阅牟志京：《〈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见徐晓等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1版，第219页—224页）。

从1966年到12月底到1967年1月18日，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时期内，三四名毫无办报经验的中学红卫兵酝酿、策划、编辑、出版了一份报纸，《中学文革报》的创办过程典型地体现了文革初期红卫兵小报的短、平、快特征。

红卫兵小报都以大量篇幅刊登“中央首长”的“最新指示”，这正体现了文革期间“党的领导”的特殊方式：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央文革小组”，即当时所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越过了各级党组织与国家行政机构，通过报纸杂志来与群众直接联系，来贯彻其战略部署与意图。这里所说的报纸杂志，主要是当时由“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而各群众组织（特别是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也起到了传递“中央首长精神”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也是进入体制的，它们同通常所说的在政治高压时期与政府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下刊物”（注：例如，苏联政治高压时期从30年代至70年代，曾出现了大量与权力话语采取对抗态度的“地下刊物”，孕育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罗茨基等重要作家——参阅马可·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32章“‘萨米兹达特’：地下刊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相比，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当然，红卫兵小报与国家正式出版的报纸相比，仍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它的特殊的传播方式。如本文开头所引的那首诗所描述的，红卫兵小报往往采取由报纸的编写、出版者（或者由其所属的组织成员，甚至是专门的“小分队”）上街卖报的流通方式，面对面地同读者进行交流与对话。那首诗中所描写的报纸编者与读者彼此感情与思想的沟通，至少在当时是有其真诚之处的。一位曾参与在王府井大街销售《中学文革报》的办报者兼作者也回忆说：“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热烈场面我从此再没见过：人们排成长龙般的队伍，举着钱，前胸贴后胸，买到的人如获至宝，没买到的人遗憾万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价从人手中转买。人们买报那般切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在寻找真理之声……”（注：陶洛诵：《我和遇罗克一家》，见徐晓等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1版，第241页）。《中学文革报》办报人员能够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不断向封建“血统论”发动挑战，这恐怕与大街上那些“寻找真理之声”的读者对他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有关。

红卫兵小报起初以自办发行为主（《新北大》等是例外），到后来，随着一些红卫兵组织影响的日益扩大，它们所办的报纸便获得官方的认可，并开始在邮局公开发行。如清华大学《井冈山》报创刊于1966年12月1日，属于自办发行的小报；自1967年2月份始，该报改由邮局负责发行，每月出版6期，定价0.12元。同时，清华《井冈山》报还在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地设立航空版代印点，迅速扩大了报纸的发行量（注：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1967年1月9日的“本报启事”）。

红卫兵小报栏目多样、内容芜杂，但大体都有一个变化过程。报导文革动态是早期各种小报的基本任务，这些文章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是报导本派组织或兄弟组织的“革命壮举”——如《新北大》“北大纪事”栏对红卫兵小将横扫北大燕园、大破“四旧”情况的报导（注：见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新北大》第4期，1966年2月）；北京师大《井冈山》报对该校井冈山战斗团200多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火烧孔子像、刨平孔坟行动的报导（注：见北京师大井冈山战斗团《井冈山》创刊号，1966年12月9日）。其二是披露对立派别私设刑堂、

参加武斗的暴行——如关于“西纠”(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在北京六十中设立劳改所残害生命,用人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之暴行的报导(注:见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后司令部《红卫兵报》第3期,1967年1月11日);关于西安“红色恐怖队”如何私设监狱,戏弄、侮辱妇女暴行的报导(注:见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卫兵》第9期,1966年12月24日);以及湖南大学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互相揭露对方杀人罪行的血淋淋描述(注:“高司”湖南大学总部办的《红卫兵》第21期,1967年6月10日,报导了42名“高司”学生被“长沙工联”活活打死的情况,并发表了湖南师院第三食堂工人××的文章《我所看见的杀人惨景》,叙述他在3小时中所见10多个“高司”学生被打死的场面。而一位亲近“长沙工联”的“新湖大公社”红卫兵在自己一派主办的《新湖大》第13期,1967年11月7日,撰文详细描述“高司”红卫兵如何残杀“长沙工联”的两名“造反战士”的法西斯暴行——两人均被刺刀捅死,生殖器被割,并配发了血肉模糊的死者照片)。

第二阶段的红卫兵小报上刊载了大量的政论文,这些文章貌似气度恢宏、运筹帷幄,实际上大多上属于借势压人而不能以理服人、霸气十足的官样文章。自然,也有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出身论》等论文,他们是文革时期思想界的可喜收获,显示了少数勤于思考的青年人敢于捍卫真理捍卫人的尊严而同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辩的独立精神品格。

1967年夏季,文革政治运动已开展一年。此时,红卫兵小报上的“宣言”体文章逐渐减少,政论文的比重也开始下降;各类短小、精萃的文艺作品数量的提高,成为这一阶段红卫兵小报引人注目的景观。不少小报纷纷刊载漫画、歌曲、杂文、诗歌和曲艺作品,以文艺的形式迅速反映“火热”的文革现实生活,抒发广大“革命小将”的战斗激情。一些小报的改版充份透露了红卫兵各派组织开始重视以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信息,譬如由中国作协造反派办的《文学战报》于1967年8月20日刊登“告读者”短文说:“《文学战报》自3月23日创刊以来,共出了25期。现因《文学战线》即将创刊,《文学战报》原来版面的任务(指发表大批政论文——引注)转由《文学战线》承担,故自下期起,《文学战报》改为以发表创作为主,用文艺形式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代新风貌”(注:载中国作协革命造反团《文学战报》第24、25号合刊,1967年8月20日)。改版前的《文学战报》主要刊载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政论文,以及批判周扬、邵荃麟的文学理论和批判电影《武训传》、小说《刘志丹》等“大毒草”的文艺评论为主;改版之后,这份报纸发表了众多的诗歌、杂文作品,成为文革时期较为专业化的文学类小报。

杨健所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注: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把红卫兵小报上发表的诗歌列入“地下文学”范畴讨论,这在笔者看来是不妥当的。且不说一批红卫兵小报纷纷由自办发行改为公开发行,即使是那些坚持自办发行、自行销售的小报,如前文所说,实际上仍然是纳入体制的。判定某种文学(诗歌)现象属于“地上文学”还是“地下文学”,主要不在于它以什么传播方式流通于社会,而应看它对官方意识形态、艺术政策、审美趣味是采取趋同、迎合,还是疏离、反抗态度。从整体上看,红卫兵小报诗歌基本上是文革意识形态和审美情致的产物,它们与国家出版物上刊载的诗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本论文把它当作“地上诗歌”来看待。

红卫兵诗歌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诞生,而大批红卫兵小报的出现为红卫兵诗歌提供了发表园地,培育了人数众多的诗歌作者队伍。红卫兵诗歌诞生的公开空间,内在地制约着红卫兵的抒情姿态;红卫兵小报独特的生产过程、流通渠道和读者群,深深地影响着红卫兵诗歌的写作方式、传播途径和被消费(阅读)状况。

最初的红卫兵诗歌都是创作于广场、大街等大众空间,抒发的是一个时代民众的公共情感,大多数作品属于即兴之作,具有“顺口溜”的特点:

红旗飘扬，  
人海歌浪，  
千万双手臂高举，  
亿万人同声欢唱：  
万岁万岁毛主席，  
伟大舵手指方向

——杨东明：《永远跟着毛主席》（载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新北大》第12期，1966年9月30日）

红卫兵诗歌属于在文革初期的狂欢化社会生活氛围中应运而生，并充份体现其“广场狂欢”特性的特殊诗歌品类：

好哇！好哇！  
就是好！  
临时革命委员会，  
让我们一千遍、  
一万遍地大声为您大声叫好

——《我们大声为您叫好——献给成都工学院临时革命委员会》（载红卫兵成都部队政治部《红卫兵》第19期，1967年3月26日）

红卫兵诗歌作者大多以站在广场上发表宣言和檄文的姿态、语式来抒情表意：

我向着山城高呼，  
四百万革命群众；  
我向着山城呼啸，  
革命的工农兵同胞。  
……啊，四百万革命群众！  
啊，革命的工农弟兄！  
在毛泽东旗帜下团结起来，  
杀！杀！杀  
杀向黑线头子罪恶的黑宫

——李亮：《血之歌——致全市革命群众》（载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山城红卫兵》第7期，1966年12月23日）

如前文所说，红卫兵小报通常是采取作者、编者与读者直接交流的传播方式，甚至就在大街、广场上大声朗读小报上的文章、诗作，结果，或引起激烈争论，或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有些红卫兵组织还把自己的诗作配上音乐、舞蹈，进行广场演出。

1967年5月29日，北京最初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为纪念红卫兵组织诞生一周年，在天安门广场演出了《红卫兵组歌》。组歌由12首诗作构成，全面展示了初期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进程。其中的第3首《白色恐怖奈我何》叙述“老红卫兵”面对种种政治迫害的抗争：

高天寒流滚，

平地阴风刮，  
白色恐怖乌云重，  
“反革命”的帽子顶压……  
怕什么围攻漫骂，  
我们的双手，  
撑得起万里蓝天，  
我们的双肩，  
扛得起高山千架。  
为人民，  
不怕牺牲流血；  
为革命，不怕披镣带枷。  
我们天不怕，  
我们地不怕  
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敢把皇帝拉下马！

（见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批判刘、邓、陶联络站编印的《八·一三歌声》，第324页—326页，1967年10月，内部出版、发行。）

这一组诗是诗化的红卫兵宣言书，它的作者、表演者及观众都是有着相同经历的老红卫兵，并且由于江青等人对老红卫兵历史的否定，当时他们正共同承受着政治上的重大压力。此时，他们处在同一个广场空间，表演着、倾听着自己的“造反歌”，所引起的情感共振是可以想见的。而这恰恰最能反映、说明红卫兵诗歌的基本特征：它是一种广场诗歌艺术。

如果说“在消费——阅读中，应当区分功能性消费和文学性消费这两种情况”（注：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90页），那么对红卫兵广场诗歌的接受显然是属于“功能性消费”，这一种政治性的“功能消费”，这些诗提供给读者（观众）的基本上是社会政治信息和意识形态理念，它们给读者（观众）带来的是政治性的热情宣泄，而非有距离的审美的娱悦。在红卫兵广场诗歌中，这种政治性“功能消费”与其作者、表演者、读者（观众）的青春激情是融为一体的。因此，红卫兵广场诗歌必定会采取政治抒情诗的体式，它与现代中国的政治抒情诗传统自有其内在的联系；但文革时期广场上的红卫兵政治抒情诗又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最主要的是这种广场诗把诗的政治性消费功能推向极端：诗歌的写作、阅读、表演构成了一种政治行为。

1967年5月29日的这次天安门广场诗歌表演，实际上就是老红卫兵们的一次政治大示威。而如本章开头引用的那首诗所描写的“卖报”行动，其实也是一次政治行动：它既有严密的“小分队”组织，也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开炮，迎接“江城新曙光的来到”；读者的反应也是“政治性”的：既有对立派组织的“盯梢”，也有同情者、支持者的悉心保护，以致诗作者自豪地宣称，“这哪里是卖一张张的报，/世界上卖报者哪有这样的骄傲。”

朱自清当年在总结40年代学生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朗诵诗的特点时，强调了它的“行动性”：“它不止于表示态度，却更进一步要求行动或者工作。”（注：朱自清：《论朗诵诗》，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56页、第256、257页）在红卫兵广场诗歌这里，朱自清所说的朗诵诗的“行动”成了直接的政治行动，而且其行动往往与政治暴力连结在一起。文革时期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的红卫兵诗歌代表作《放开我，妈妈》这样写道：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

再见了，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  
命令我立即出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庭犁院怎能横枪跃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誓作千秋雄鬼不还家！

（注：《放开我，妈妈》曾在各地红卫兵小报上登载，笔者所见较早的版本是发表在1967年7月29日吉林的《长春公社》报上，以《放开我妈妈》为题（标题没加标点），并未署作者之名，但写有“寄自武汉”字样，过了一年后，此诗收入《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时，署有作者“武汉吴克强”字样，并在诗的结尾上注上写作日期“一九六七·六”。）

许多红卫兵小将就是唱着像《放开我，妈妈！》这样的诗而走向阶级斗争的“战场”的。《放开我，妈妈！》具有强大的政治鼓动力量，以至于在全国各地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各种“修改本”，各派红卫兵组织往往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的政治斗争需求，给这首诗不断变动补充新的内容，切实把诗歌的“战斗武器”（“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相结合）作用发挥到了极点。

朱自清在论述朗诵诗的特点时，还谈到它“是群众的诗，是集体的诗。写作者虽然是个人，可是他的出发点是群众，他只是群众的代言人”（注：朱自清：《论朗诵诗》，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56页、第256、257页。）红卫兵的广场诗也把朱自清所观察到的朗诵诗“集体性”特点推演到极端。如前文所说，红卫兵小报大多由某一红卫兵组织创办，因而有着较为鲜明的派别倾向。红卫兵小报诗歌的作者有时不止一人，而是数人或整个组织的人，不少诗歌用的是某一组织的集体笔名，这些诗歌是写作小组集体创作的产物。1967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诞辰，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成的“向日葵”创作组在这一天的《新北大》上推出了抒情长诗《红太阳颂》：

无边的大海呵，  
请鼓动澎湃的心潮，  
巍峨的高山呵，  
请挥舞激情大笔；  
撼天的春雷呵  
请擂动雄浑的鼓点；  
万里的长风呵  
请奏起《东方红》乐曲。  
让我们同声歌唱，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主席！……

（注：向日葵：《红太阳颂》，载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新北大》第145期，1967年12月26日）。

此诗的人称代词“我们”鲜明地标识出了红卫兵诗歌的集体写作状况。也有一些诗歌虽然出自写作小组之手，但诗中的人称代词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单数。譬如一首由“野草地”红卫兵小组撰写的诗《战士的话》写道：“我是一个青年学生，/我是红旗野战军的士兵。/不！我是一只穿甲弹，/时刻在炮膛里执勤！”（注：野草地：《战士的话》，载长春地质学院《长春公社》第11期，1967年8月15日。）此诗的主词“我”并非是个体的指称，而是“我们”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当然，更多的红卫兵小报诗歌属于个人署名的作品，然而，即使是由单个人完成的作品，其个性特征的缺席也是十分常见的。譬如有这样一首由少数民族造反派写的诗：

畲家想念毛主席，  
山歌对着太阳唱；  
毛主席像章挂胸前，  
日日夜夜暖心房。

（注：云和县畲族钟进和：《畲家想念毛主席》，载浙江省丽水地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丽水战报》新134期，1968年12月26日。）

这首诗的抒情主体可以置换成“壮家”、“侗家”，或其他少数民族；而情感的倾诉对象也可以变为“刘主席”、“华主席”，或其他领导人。对此诗的抒情主词和宾词作任意更换的实验表明：这是一首根本缺乏个性的诗作，这类诗歌写作不过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集体式”写作，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套语式”写作。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作更具体的论述。

朱自清还有一个观点也许对我们认识红卫兵诗歌有一定启示。他指出，对“集体的诗”来说，最“重要的是那氛围”，脱离了那氛围，“就不能成其为诗”，它所表达的情感，“是在紧张的集体的现场”实现的，“单是看写出来的诗，会觉得咄咄逼人，野气、火气、教训气；可是走近群众里去听，听上几回就会不觉得这些了”（注：朱自清：《论朗诵诗》，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256页、第256、257页。）。

死为红色小鬼，  
生做革命闯将。  
毛主席撑的腰，  
岂能向你弯？  
要血，  
一腔滚烫！  
要泪，  
半滴不淌！  
“检讨书”吗？抱歉！  
我们，  
和你们——  
骨头不一样！

造反派，  
就是钢锻铁铸。  
跟着毛主席，  
革命造反！  
这算罪名吗？  
好！  
这罪名，  
再列一千条，  
我们——担！  
你听着，莫打颤：  
谁笑到最后，谁才最好看！  
今天，在这黑角落，  
你把我们“审判”；  
看明日：  
我们要登上高台，  
四周红梅怒放，  
昂首向东天  
红日霞光！  
揪出你们——大小赫鲁晓夫  
当众审判！

（注：佚名：《造反者日志·答黑党委“审讯”》，见《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第66、67页。）

如果能置身于“因造反而遭到压制迫害”的“现场”，这样的诗会引起读者（观众）强烈的共鸣，而产生巨大的情感冲击力。在远离“现场”的今天的读者看来，就不免觉得“大而无当”、几无任何艺术感染力；但经历过文革历史的当事人，重读这些当年的造反诗，或许会有更为复杂的情感反应也说不定。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是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红卫兵小报诗歌集，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1968年12月印制，印数达3万册。该书搜集范围较广，共收集全国1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红卫兵小报诗作97题107首，是对文革初期红卫兵小报诗歌的一次大检阅。《江城壮歌》和《战地黄花》也是文革前期由红卫兵组织印制的小报诗选。《江城壮歌》由“钢二司”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钢工总”东方红兵团编印，1967年在武汉发行，收录诗作77首，多数作品写于轰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是对当地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记录。《战地黄花——八一八诗选》的编选者为吉林师大“八·一八红卫兵”《革命造反军报》编辑部，于1968年8月18日在长春印行，共收录诗作63首、对口词一首、春联一组。

不过，像《写在火红的战旗上》、《江城壮歌》、《战地黄花》这样在全国或一省范围征选红卫兵小报诗作的举措在文革动乱时期毕竟是少见的。由于不少小报随着红卫兵团体自生自灭，由于当时人们不够重视保存这些资料，因此现在研究者根本无法搞清楚红卫兵小报的确切数量，连一个大体的数字也无法得出。海外的有心人早在文革时期就开始注意红卫兵出版物的情况，但他们的所见恐怕也不会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翻阅过500多种近万份红卫兵小报，觉得这不过是其总数的“九牛一毛”。当然，从笔者收集到的1000余首诗中，也能一窥红卫兵诗歌的大体风貌。

注：海外有关红卫兵出版物的资料有：

(1) Lee, Hong Yung, Research Guide to Red Guard Publications, 1966 -196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李洪永：《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

(2)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URI), Catalogue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 Held by URI, Hong Kong: URI, 1970. 《联全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

(3) U.S.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Daily (approx), 1950 -1977.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中国大陆报刊概览》(1950—1977)。

□ 原载长春《文艺争鸣》2001年5号

~~~~~

【文艺评论】

对历史真实的歪曲与误读——与“姜文们”商榷

• 王东成 •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们”（影片中叫“马晓军们”）活得极潇洒，极惬意！他们住在军队大院里，父辈是当时极受全社会尊敬（还有点儿敬畏）和艳羡的“支左”的解放军，自己是根正苗壮的“红五类”。那时，长他们几岁的人，一部份“接受再教育”去了农村，一部份如愿以偿，颇为幸运地进了军营，因此，北京城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常常成群结队地疾驰着自行车从街市上呼啸而过；他们愿意上学就上学，不愿意上学就不上学；课堂上，他们随心所欲地耍笑老师，弄得老师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别人上课，他们无忌地破门而入而又跳窗而出；他们蛮横地威胁老师，迫使老师忍气吞声、屈辱地就范；他们恣意地玩撬门破锁、“拍女孩”、打群架的游戏……这种潇洒和惬意，沉淀、凝结为“姜文们”的记忆。“屁股决定脑袋”，应该说，对于“姜文们”来说，这种记忆是真实的，是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得来的，是有根有据的。这种记忆由于“姜文们”日后的“劫后辉煌”（成了明星式的“作家”、“艺术家”），而没有经受命运的诘难和理性与良知的拷问，从而变得更加坚执和缺乏自省。记忆就是态度，“姜文们”的记忆就是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姜文们”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人一厢情愿地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姜文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黑色幽默”，并非是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态度。对此善良友好的议论，连“姜文们”自己都不敢苟同。不信，请读姜文自己几次关于此片的谈话。

另外，最要紧的是从“文本”出发，忠于自己的艺术欣赏感觉，我建议坚持此议的朋友再认真地看一遍这个片子。

与“姜文们”的记忆相反，在广大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的记忆里，“文化大革命”绝非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是恶梦联翩的凄风苦雨。在他们的记忆中，至今还萦绕着当年被抄家、被绑架的砸门声、叫骂声，至今还镌镂着当年被批斗、被殴打的泪痕与血印；他们曾揪心而又惊悸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同事的书籍、文稿与国家的文物一起被抛入火堆，化为灰烬，看着自己的父母、兄弟、师友、亲朋被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揪斗、游街；他们曾痛心疾首地目睹自己的同学、同事倒毙于“文攻武卫”的弹雨中；他们曾三番五回地被关进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没完没了违心地写反省交待，检举揭发材料；他们曾迷惘而又痛心地面对学校停课、工

厂停产、市场萧索；他们曾离妻（夫）别子（女），步履维艰地跋涉在“五七道路”、“六二六道路”上，把沉重的叹息和思考抛在了曾经以为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应该说，与“姜文们”的记忆一样，广大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的记忆也是真实的，也是他们的命运与遭遇赋予他们的。但是，这截然相反的两种记忆，究竟哪一种才是真实的历史呢？或者说，究竟哪一种才能无私无情地复映出历史的真实与是非呢？

我认为，凡是能够无私无情地复映出历史的真实与是非的郑重的记忆，都是深切体验与超越自我的统一的结果。它不仅仅是记忆拥有者亲身经历的沉淀与凝结，而且，更是记忆拥有者良知的勃发，理性的升华，更是记忆拥有者的亲身经历在良知与理性的拷问下，对超越个人遭遇的民族命运与民族记忆的认同和尊重。我想，“姜文们”应该与广大正直的知识分子、工农大众一起拷问一下自己的良知与理性，叩问一下民族的命运与民族的记忆。这种拷问与叩问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姜文们”用自己的并非伪造的灿烂记忆，在抹煞、篡改着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在粉饰、伪造着“文化大革命”那黑暗、荒唐、耻辱的历史！

如此结论，“姜文们”以为然否？在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中国大地风雨如晦，地火奔突（连边陲小城都如此，更何况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文化大革命”策源地的北京呢？）。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日甚一日的倒行逆施的仇恨与不满在日甚一日地增长，逐渐由“地下”涌上“地表”。他们偷读“手抄本”，传播“小道消息”、“政治谣言”，评议“红墙里的秘密”，焦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后肩并肩手挽手地走向风雷激荡的天安门广场，把“四人帮”和极“左”路线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与火山口，敲响了它们覆灭与垮台的丧钟。

但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种时代大气候的风云一丝一缕也没有飘入“姜文们”生活的具体环境中，“姜文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完全隔绝于这种时代的大气候。如此说来，《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展示的环境是不够真实、不够典型的。“姜文们”用具体环境的真实描写来抹煞时代氛围，从而完成了对历史真实的歪曲与误读。

如此看法，“姜文们”以为然否？

□ 原载《中国电影周报》1996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